

# 调动父母资本促进融合：新移民父母促进 1.5 代和第二代移民子女在新加坡学术与社会文化融合的策略

## 摘要

本文探讨新加坡新移民父母如何运用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作为策略，支持其 1.5 代和第二代子女的学术与社会文化融合。基于对来自中国大陆、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少数非亚洲国家的 64 位移民父母的深度访谈，我们首先指出了父母在促进子女学术融合上所采用的不同策略。研究发现，非华裔父母主要依靠“桥接型”社会资本，通过与当地父母建立联系来帮助子女适应新加坡的教育系统；而华裔父母则利用源自同胞网络的“聚合型”社会资本，通过微信等网络平台来交换教育资源。除了学术融和之外，移民父母也积极支持其子女在社会文化上的融合。部分父母通过调动其跨国文化资本以促进子女更好地适应新加坡社会文化环境；另一些父母（特别是非华裔语言少数群体）则将其经济资本转化为子女的文化资本（如习得中文语言能力等），以增强子女在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社会中的归属感。研究还发现，部分移民父母通过运用自身的跨国社交网络拓展子女的社交圈。这种策略不仅帮助子女维持与祖籍国同龄人的联系，同时促进了他们在新加坡同族裔社群内的社会互动。通过这种双重社交网络建设，父母致力于协助子女实现成功的文化融合，使其在保持祖籍国文化联系的同时，能够有效参与新加坡主流社会文化生活。

## 引言

2000 年至 2010 年间，新加坡经历了一场现象级的移民潮，这一人口增长主要由旨在吸引“外国人才”的经济政策推动，以维持全球竞争力并促进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型（Tan & Bhaskaran, 2015）。在此期间，永久居民（PR）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7.1% 上升至 10.7%，而非居民外国人（包括工作证持有者、学生及其家属）的比例则从 19% 增至 25%（新加坡统计局，2010）。单就 2008 这一年，就创下 79,000 名外籍人士获得永久居民身份这一纪录，另有 20,000 人入籍新加坡公民（国家人口与人才署，2013）。新加坡的移民定居政策极其严苛。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新移民多为高技能人才，且如 Wang 和 Zhou (2021) 所指出的，他们通常较为年轻，或在新加坡组建家庭，或将已有的年幼子女带到新加坡与其一同定居。尽管近年来移民政策收紧导致新移民增速放缓，但 21 世纪初的这场移民潮已产生深远影响。移民融合至今仍是新加坡政治讨论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不仅揭示了新移民面临的社会融和挑战，还探讨了关于他们“能否融和”的社会话语（Ho & Kathiravelu, 2022；Ortiga, 2015）。此外，大量研究聚焦于各类融合政策、机构以及社区和学校的支持体系如何帮助移民及其子女——特别是 1.5 代和第二代移民——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社会（Teng 等, 2014）。

然而，现有研究对移民父母如何具体支持子女取得融和的策略仍缺乏充分关注。大多有关移民研究的文献中，关于融和策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移民家庭迁往西方国家的情境，对向东迁移的移民群体则较少涉及。在新加坡背景下研究 1.5 代与第二代移民子女<sup>1</sup>的社会融合问题是相当重要且具有时效性的，特别是考虑到新加坡面临的人口挑战

---

<sup>1</sup> 我们将 1.5 代移民子女定义为那些在目的国以外出生并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移民的人，而第二代移民子女则是那些在目的国出生的人。

——包括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青年人口减少以及快速老龄化等问题。作为新加坡未来人才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移民子女的社会融合不仅关乎其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更对整个社会有深远影响。本研究聚焦 64 位在新加坡抚养 1.5 代与第二代子女的移民父母的实践经验。这些父母共享一个核心目标：帮助子女适应新加坡教育体系并实现社会文化层面的融合。本文旨在解析父母们在这两个维度上促进子女融合的具体策略。

本研究发现将分两个主要部分呈现：首先，我们考察新移民父母如何应对新加坡教育体系，以支持子女的学业融合。研究发现，非华裔移民父母往往通过与本地家长建立联系获取“桥接型社会资本”，从而更好地理解本地教育体系并满足子女学习需求。相比之下，华人移民父母更倾向于依托同乡群体形成的“聚合型社会资本”，通过微信等平台共享资源和经验，帮助子女适应本地教育环境。其次，我们会分析父母促进子女社会文化融合的策略。部分父母运用既往迁移经历积累的跨国文化资本，引导子女适应新加坡社会文化环境；而一些非华语背景的少数语言群体父母则通过经济投入，支持子女学习华语和中华文化，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以增强子女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社会中的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父母普遍重视子女保持本族文化认同和与原籍国的联系，同时也鼓励其积极参与到新加坡社会当中。为此，他们积极构建本地和跨国社会网络，促进子女与原籍国同龄人及本地同乡社群的互动。通过这些努力，父母希望子女能在融入新加坡社会与维系文化根源之间取得平衡。

论文结构如下：首先回顾移民融合的相关文献，着重分析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在促进移民子女的学业及社会文化融合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介绍有关新加坡新

移民家庭的背景情况、阐述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最后呈现研究发现并进行总结。

## 文献综述：移民子女的融合与父母资本的作用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移民定居和适应相关的移民研究领域的理论视角已经发生了显著转变，融合（integration）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早期的同化（assimilation）模型。经典同化理论家认为，移民遵循着一条线性、单向的发展路径，从而最终完全融入东道国主流社会(Gordon, 1964)。然而，融合理论家对此提出挑战，指出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移民并非简单地放弃原有文化而全盘接受东道社会的文化。受 John Berry(1997) 文化适应模型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家特别强调，移民实际上面临两个核心问题：其一，他们对于保持原有文化认同的重视程度；其二，他们对参与和融入东道社会文化的重视程度。研究表明，融合模式——同时保持高水平的原有文化认同和积极参与到东道社会之中——不仅成为移民适应新环境的最普遍方式，而且也能为移民在各方面取得最优的结果(Berry et al., 2006; Berry & Hou, 2016; Nguyen & Benet-Martinez, 2013)。

虽然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移民文化层面的融合，但社会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则将融合视为包含多个维度的过程，而文化只是其中之一(Ager & Strang, 2008)。例如，Esser (2006) 提出的四种融入形式包括：文化习得、社会安置、人际互动和身份认同。Bosswick 和 Heckmann (2006)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移民融入划分为：结构性融合（参与和融入核心社会制度）、文化性融合（适应东道国社会文化规范同时保留原籍

国文化元素）、互动性融和（建立东道国社会网络与人际关系）以及认同性融和（形成归属感）。无论在哪个维度实现有效融和，获取必要资源（或资本）都是关键。

Phillimore 等人（2018）强调，这些资源的可获得性（或缺乏）将显著影响移民融和的进程和结果。对于 1.5 代和第二代移民儿童而言，家庭资源特别是其父母拥有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包括资金、知识与文化素养、专业技能、人际关系等）尤为重要（Portes & Zhou, 1993; Zhou & Gonzales, 2019, 第 387 页）。

现有研究广泛运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阐释移民家庭社会网络在融和过程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Grzymała-Kazłowska, 2015; Li & Pitkänen, 2018; Thondhlana 等, 2016）。其中部分探讨移民父母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在校学业融入的研究，与本文有着显著的关联性。例如，Zhou (2005) 对纽约唐人街华人移民的研究发现，工人阶级华人母亲通过在教堂、寺庙和中文学校等场所的社交活动，得以接触中产阶级同乡的人际网络。这些人际网络为移民父母提供了重要的教育信息（如高中排名），增强了她们支持子女学业适应的能力，也提升了子女在美国取得学业成功的机率。与此同时，Shah 等 (2010) 在英国的研究表明，巴基斯坦移民父母通过动员其社会资本（如与已在英国定居的亲属或同乡建立的网络）来克服对当地教育体系的不熟悉，从而更好地支持子女的学业融入。

然而，Shah 与其同事的研究也指出，虽然同乡网络在初期有助于新移民了解东道国本地的教育体系，但从长远看往往存在“视野局限”（Crozier & Davies, 2006, 第 688 页）。Trevena 等 (2016) 对英国波兰移民父母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现象，并用 Putnam (2000) 的社会资本理论进行解释。Putnam 区分了“聚合型”（bonding）和“桥接型”

(bridging) 社会资本：前者来自与同族群、同国籍或同语言者的联系，后者则源于与不同背景者建立的关系。对移民而言，这两种资本分别对应与同乡社群和东道国本地成员的联系（Thondhlana 等, 2016）。借助 Putnam 的理论框架，Trevena 等指出，波兰移民父母主要依靠同乡间的聚合型网络获取英国教育体系的相关信息。这类聚合型关系却最多只能帮助移民群体“勉强应对”其在东道国所面临的各种困境（Putnam, 2000, 第 23 页），但要更有效地支持子女长期学业融和，则需要与本地英国家长建立桥接型关系，以获取同乡网络中难以获得的学校体制内部信息（同上，第 23 页）。

除社会资本外，移民父母的文化资本也对支持子女在学业、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融和起到重要作用。Bourdieu (1986) 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物化”的文化资本（如具体的文化商品）、“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如学历/教育资格）和“具身化”的资本（如技能和情感倾向等）。Chao (2013) 对美国中产华人移民父母的研究显示，这些父母拥有丰富的具身化文化资本，特别是其优秀的英语能力，他们利用这一优势促进子女的社会文化和学业融和。凭借出色的英语能力，这些父母充当子女的英语辅导者和文化中介，帮助其适应新的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这为其子女在东道国社会成功取得融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Chao 的研究同时也强调了经济资本的重要性。当中产父母缺乏某些文化资本（如语言能力）时，他们也可以通过经济资本进行补偿，如聘请英语家教或翻译与学校沟通，从而在语言障碍下仍能支持子女融入。

纵观近期的移民研究，学界对从“跨国视角”探讨融入策略和移民资本的关注度显著提升（Glorius, 2019; Ogden, 2024; Zhu, 2019）。学者们日益聚焦于移民可能拥有的跨国社会文化资本（Levy 等, 2013），包括跨国社会网络、双语或多语能力、跨国互

动能力等 (Carlson 等, 2017; Choi 等, 2024) , 并探究他们如何运用这些资源在适应东道国社会的同时维系与原籍国的联系。然而, 据我们所了解的, 目前尚未有研究专门探讨移民父母如何将跨国资本转化为支持 1.5 代和第二代子女融入的资源。Choi 等 (2024) 的研究虽有所涉及, 但仅简要提及。他们发现一些有海外经历的中国父母会教导子女应对陌生环境的技巧 (如处理种族歧视的策略) 以帮助其社会文化适应。然而, Choi 和其同事的研究重点仍在于跨国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和培养, 而非父母如何策略性地动用这些资本促进子女的社会融和。这正是本文希望深入探讨的方向。

本研究基于现有关于移民融和与资本获取的文献, 探讨移民父母拥有的各类资本 (无论是国内还是跨国背景下获得的) 及其他们如何动员这些资本来促进其 1.5 代和第二代子女的社会融合。我们主要关注与移民子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三个融和维度: 学业、社会和文化。研究以东南亚城邦国新加坡为背景, 弥补了当前非西方移民语境下家庭融和策略研究的不足。

### 背景: 新加坡的新移民家庭

移民是新加坡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24 年 6 月, 新加坡 604 万总人口中, 非公民占相当大比重: 包括 54 万永久居民 (占 8.94%) 和 186 万非居民 (占 30.8%) , 后者涵盖就业准证持有者、学生及其家属 (新加坡统计局, 2024)。受早期移民和殖民历史影响, 新加坡居民人口呈现多元族群构成: 华人占 74%, 马来人 13.5%, 印度人 9%, ”其他” 族群约 3.4% (同上)。尽管非居民的族群构成未被公开, 但普遍推测其与居民人口构成比例相似。2000 年至 2010

年间，新加坡移民数量显著增长，部分归因于当时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旨在应对新加坡本地低生育率、技术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Yap, 2014）。同时，新加坡移民制度具有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仅高技能工作者和年轻学生移民有机会获得永久居留权（Liu, 2014）。因此，2000 年后成功定居新加坡的新移民大多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属于中上阶层（同上）。Wang 和 Zhou (2021) 进一步指出，这些新移民普遍年轻，许多人或计划在新加坡组建家庭，或已携家人在新加坡共同定居。

现有关于新加坡移民家庭的学术研究较为有限，且主要聚焦于韩国和中国大陆的教育移民家庭（如 Bae 和 Park, 2016; Huang 和 Yeoh, 2005, 2011; Kim, 2010; Yeoh 和 Huang, 2010）。这些研究多探讨教育流动作为家庭资本积累策略背后的逻辑，以及跨国母职相关的议题，对移民子女在新加坡学校和社会的融入过程关注不足。移民父母如何影响子女在新加坡的融合进程这一问题仍待解答。此外，这类教育移民家庭仅能代表本研究关注的移民父母及其 1.5 代和第二代子女中的一小部分。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原籍国移民父母促进子女学业和社会文化融合的策略，旨在拓展移民家庭研究视野。

## 研究方法

本研究聚焦于新移民父母对其 1.5 代和第二代子女在新加坡社会融入过程的影响。研究采用滚雪球采样法，通过研究人员的个人社交网络和公共场所张贴广告的方式招募参与者。本研究在样本设计上力求反映新加坡 1.5 代和第二代移民子女的主要来源国构成，尽管研究目的并非追求统计代表性。由于缺乏移民子女国籍构成的官方统计数据

据，我们基于新加坡外国出生人口的相关研究，确定马来西亚、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为主要的移民来源国。

尽管马来西亚移民父母在新加坡人口中占有重要比例，但我们有意将其排除在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之外。这一决定基于研究对“融合”问题的核心关注，我们认为所选样本应更好地体现移民融合过程中面临的典型问题与挑战。现有研究表明，由于新马两国在社会文化和地理上的高度相似性，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移民往往不被视为融合研究的典型对象（Liu, 2014），且他们自身也可能认为融合问题相对不那么重要（Yuen & Cheung, 2014）。因此，我们将招募重点放在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移民群体，同时纳入菲律宾移民群体——这是新加坡一个重要但常被忽视的社群（Todayonline.com, 2017），以及其他国籍的移民。

截至本文撰写时，研究共纳入 64 位移民父母（母亲 53 人；父亲 11 人；中国大陆 31 人；印度 14 人；菲律宾 12 人；印度尼西亚 4 人；其他国籍 3 人）。所有参与者均为成年后移民新加坡，其子女或在新加坡出生，或在 12 岁前随父母移居新加坡。多数参与者育有多名子女，且至少有一名子女目前就读于公立中小学。参与者的居留身份呈现多样性（新加坡公民 19 人；永久居民 34 人；长期访问准证 3 人；S 准证 2 人；就业准证 4 人），其子女的居留身份也同样多样（新加坡公民 31 人；永久居民 21 人；家属准证 8 人；学生准证 4 人）。

虽然研究设计力求涵盖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移民家庭，但实际样本在这一维度上相对同质。基于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状况，大多数参与者可被归为中产阶级。仅有 5 位

参与者的月总收入低于 2023 年新加坡居民家庭收入中位数 10,869 新元（新加坡统计局，2023）。在 64 位参与者中，仅 6 人未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但均完成高中学历）。这一社会经济特征与新加坡的移民政策相符——只有高技能移民才被允许携带直系亲属定居，并申请永久居留资格（B. S. Aa. Yeoh, 2006），而低技能移民则不享有同等权利。

在 2021 年初至 2023 年初期间，我们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一对一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多数参与者接受了两次访谈。每次访谈持续 60-90 分钟，使用参与者首选的语言进行。所有访谈内容均被逐字转录，其中以华文进行的访谈则被翻译成英文以供分析。本研究中的所有参与者信息均已匿名处理。下文将详细分析移民父母支持子女在新加坡实现学业和社会文化融合的具体策略。

## 学术融合

研究发现，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Perreira 等，2006；Antony-Newman, 2018；Barabanti 等，2019），移民父母在协助子女适应新加坡教育体系时面临显著挑战。这些在母国完成全部教育经历的家长普遍反映，新加坡的课程设置、教学体系、校园文化及学业要求对他们而言相当陌生。这种陌生感常常导致他们担忧无法为子女提供有效的学业支持。菲律宾籍母亲 Rebecca（育有两子）的表述颇具代表性：

"我对新加坡的学校系统完全不熟悉，那些专业术语——A 水准、O 水准——都是我没接触过的概念。我甚至难以准确评估孩子的学业表现 [...] 我对整个教育体系架构缺乏全面的了解。有时我会自责，觉得没有为孩子做好应考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面临这些挑战，移民父母展现出较强的资源调动能力。他们积极获取并运用两种形式的社会资本——聚合型与桥接型 (Putnam, 2000)，以克服对本地教育体系的陌生感，有效促进子女的学业融合。

### 本地家长网络：桥接型社会资本的运用

研究数据显示，非华裔家长主要依托与新加坡本地人建立的社交网络所形成的桥接型社会资本来支持子女学业发展。在被问及他们是如何应对新加坡的教育体系时，大多非华裔家长通常会回答说通过他们在本地的朋友、邻居和同事来获得信息。印度籍母亲 Anika 的案例具有典型性：在女儿小学毕业面临升学选择时，她对新加坡的中学教育体系感到十分陌生。为此，她主动向她在本地的社会人际网络寻求帮助（如向其本地同事寻求建议），以确保女儿在升学选择上不落后于本地学生。Anika 回忆道：

"[我的孩子]作为我们家在新加坡求学的第一代，这一切对我[作为移民家长]都是全新的体验。教育体系是我特别想为女儿了解的领域，尤其是在报考中学方面 [...] 我先自行查阅资料，随后向我新加坡本地的年长同事请教，他们分享了关于中学教育的实用建议。"

类似的策略也见于菲律宾母亲 Ava 的经历。在辅导女儿华文课程遇到困难时，她选择向新加坡华人朋友寻求帮助：

"我们的社交圈以新加坡本地人为主，其中大多为华人，马来朋友较少。所以在 [女儿的华文] 学习方面，我主要向新加坡华人朋友寻求建议，[询问他们] 该如何有效辅导..."

研究还发现，KiasuParents.com 这一本地育儿论坛成为许多移民家长获取教育资讯的重要平台。菲律宾籍父亲 Richard（育有两子）表示：

"虽然存在菲律宾移民的 Facebook 群组，以及一些有关移民定居的论坛等平台，但我和妻子极少参与到这些论坛当中。我们在教育问题上更依赖 KiasuParents 这类本地网站。"

KiasuParent.com 是一个新加坡育儿论坛，其主要功能是促进本地家长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该平台为家长提供了信息交流、建议咨询以及子女教育问题支持的重要渠道 (Göransson, 2015)。Devan 详细描述了他如何通过 KiasuParent 论坛来理解家校距离对孩子小学入学的影响，并对该论坛及其用户提供的帮助表示赞赏：

"我们当时对一公里、两公里的范围划分机制不太了解。当你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时，KiasuParent 网站总是出现在搜索结果的最前面。通过阅读论坛内容，你很快就能明白具体的运作方式。这个平台上有许多用户创建的子论坛，进入

这些讨论区后，你会发现家长们不仅深入探讨这些问题，而且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详细的分析。"

同样地，Richard 分享了他是如何通过该论坛获取本地家长关于选择补习中心的实用建议，以帮助孩子获得额外的学业支持：

"我们从朋友那里听说，或者是在论坛[KiasuParents.com]上了解到，这里很多孩子实际上都在参加补习[...]所以我们认为也需要让孩子参加补习，至少能跟上其他同学的进度[...]数学是在 The Learning Lab 补习，其他科目则选择了 Mind Stretchers [...] The Learning Lab 确实比较贵，但它的口碑很好。至于华文，我们听说 Berries 很不错。在报读 Berries 之前，我们其实先给孩子报了 Julia Gabriel 的成竹班(Chengzu)，效果还可以，但我们从多个论坛上获得了更多推荐。"

通过积极参与 KiasuParents.com 论坛上新加坡家长的讨论，像 Richard 和 Devan 这样的非华裔移民家长得以跨出原有的社交圈，与本地家长群体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所产生的桥接型社会资本，有效促进了信息的流通和资源的获取，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支持子女适应新加坡的教育体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Richard 的优势不仅体现在他能够获取关于新加坡教育系统的宝贵信息这一社会资本上，更在于他拥有的可观经济资本。作为月收入超过 18,000 新元的项目经理，他完全有能力将社交网络中获取的建议付诸实践。例如，在了解到各种

有助于提升学业表现的教育资源后，他可以轻松承担那些受欢迎但价格昂贵的补习中心的费用。这不仅确保了他的子女能够适应新加坡竞争激烈的学术环境，更为他们在这一环境中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了有力保障。

### 与同乡父母的联系：聚合型社会资本

相比之下，中国家长与本地新加坡家长的联系相对较少，他们更倾向于依赖"聚合型社会资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即与移民同胞建立的社交网络——来应对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这种聚合型资本主要通过微信平台建立 (Sun & Yu, 2022)，这是中国大陆华人和中国新移民最常用的社交应用程序。在新加坡的中国家长通过微信组建家长群组，相互分享育儿经验并交流子女教育相关信息。正如 Chanderbhan-Forde (2010) 关于印度裔移民母亲社会资本和同族网络的研究所指出的，那些已有年长子女并陪伴他们完成本地教育系统的资深移民家长，在这些网络中被视为重要资源，因为他们被认为掌握了教育体系的"内部知识"。

以独生子女母亲 Pamela 为例，她将部分中国家长形容为"新加坡教育专家"。她解释说，这些家长在陪伴子女适应新加坡教育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帮助像她这样经验尚浅的中国移民家长更好地支持子女的学业融入。虽然 Pamela 也有一些可咨询的新加坡本地朋友，但她就如她以下这段话所述，许多大陆移民家长甚至比新加坡那些亲身经历过当地教育体系的本地人还要有经验。她指出：

"那些本地家长，他们自己经历过小六会考 (PSLE) 、'0' 水准、'A' 水准，所以他们大多懂得如何选学校、选科目组合等等 [...] 通常我认识的这个移民父母都是学的很快，他们最后都变得比本地家长甚至更加专家，更加了解，他们都变成这方面的专家了。因为我们小孩进了中学之后嘛，会有这个他们中学的那个微信群，那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些新移民的家长，甚至开补习班，因为他有他的小孩在，也是在这个学校。他通过带着小孩，他就了解这个小孩这个课业上面的一些需求，然后他就直接开补习班了。真的很厉害，然后他们也很愿意分享各种的信息，包括你要怎么选科呀，你整个的这个成绩要达到什么标准，你可以进入什么级别呀怎么样。"

同样地，育有两子的母亲 Winnie 向我们详细列举了她从同胞社交网络中获取的关键信息，包括：

"哪一所初级学院 (JC) 比较合适，孩子的 '0' 水准成绩在同届学生中处于什么水平，我们该怎么选学校，进了学校之后应该选哪些学科，包括在中学阶段，孩子应该参加什么课外活动 (CCA) 才能拿到 CCA 积分。"

这些涉及新加坡中学后教育路径以及学术与非学术课程的信息，对于 Winnie 这样的移民家长而言具有极高的价值。由于她们自身未曾经历过新加坡的教育体系，这些宝贵资讯能够帮助她们在孩子面临不同教育阶段转换时，做出更有依据、更明智的决策。

微信家长群不仅是中国移民家长建立团结关系的重要渠道，更是他们获取情感支持的关键平台，这正体现了“聚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的核心特征（Ryan, 2011）。对于这些既要适应新环境又要承担子女教育责任的移民家长而言，这一过程往往充满压力且倍感孤独。微信群的建立为他们创造了相互交流的空间，使家长们能够彼此扶持、共同应对教育体系的复杂性，从而提升他们支持子女学业融入的能力。Cecilia 的分享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她描述了微信群如何既为她提供了实际帮助又给予了她心理慰藉：

“群里有很多交流机会，你会发现自己的困惑也是别人的困惑，大家就能抱团取暖、互相探讨，通过这样的交流，很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或缓解。”

考虑到这些中国家长更倾向于使用母语沟通，他们主要依靠同胞家长网络来交流教育相关信息，从而增强对子女学业支持的能力，这一现象实属情理之中。我们的研究发现与现有移民融和研究的结论高度一致——聚合型社会资本确实能帮助新移民熟悉移居地社会（Bush 等, 2017）、获得实际支持（Mart én 等, 2019）并缓解文化适应压力（Hynie 等, 2011）。然而，我们也对一种普遍观点提出了质疑，即认为相较于“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聚合型社会资本在获取融入主流社会所需资源方面作用有限。正如前文所示，本研究中的中国家长通过同胞网络获得的信息质量和资源丰富程度，在很多方面完全可以媲美非华裔家长从本地网络获取的支持。这些来自同胞网络的信息资源，在中国家长协助子女适应新加坡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同胞网络并非总是带来积极影响。随着访谈的深入，我们发现许多中国移民家长对微信家长群的作用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态度。以 Cecilia 和 Audrey 为例，她们将自己在微信上建立的同胞网络形象地描述为一把"双刃剑"。尽管这个网络确实为她们提供了关于本地教育体系的宝贵信息，但她们同时也意识到，这个网络在新加坡再现了中国大陆那种高度竞争和充满压力的教育文化——即中文里常说的"内卷"现象。Audrey 的案例尤为典型，她发现同胞社群实际上逐渐阻碍了她帮助女儿真正融入新加坡教育文化和价值观的进程。她坦言：

"这个[微信群]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无休止地互相比较……这样就变成把国内那一套带过来了。我原本来这个地方是要逃离的，结果我又被卷进去了。所以我后来就退群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Audrey 在两年前毅然退出了微信家长群，并逐渐减少了与那些曾经频繁交流教育信息的同胞家长的联系。

## 社会文化融合

除了学业融合外，所有父母都强调社会文化融合的重要性，我们观察到他们通过三种方式调动其资本来支持子女的社会文化融合。

## 对跨国文化资本的调动

首先，部分父母通过自身海外学习经历积累了跨国文化资本，并运用这些资本促进子女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社会文化。以 Lucy 为例，这位来自中国的两个孩子的母亲与丈夫均在澳大利亚获得硕士学位。作为国际学生移民，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跨国文化资本，包括制度化资本（如学历）和具身化资本（如英语能力、对不同社会的理解以及跨文化适应经验）（Carlson 等，2017）。基于对少数民族裔移民面临融合挑战的亲身体验，Lucy 夫妇战略性地选择新加坡作为女儿的教育目的地，主要考量其华人为主的人口结构。这样的选择确保他们的女儿——与当地主流群体同属华族——能够在一个比澳大利亚更为熟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从而获得更顺利的融合过程。Lucy 解释道：

"我们都有留学经历——事实上，我丈夫和我之前都在澳大利亚攻读硕士学位，我们也是在那里相识的。但在澳大利亚我们始终找不到归属感[... 而在新加坡]这里对华人确实更友好。这与澳大利亚完全不同，在那里你时刻感到自己是外国人，会遭遇歧视和排斥。但这里不同，毕竟这是一个以华人为主流的社会，无论是文化氛围还是整体感觉都截然不同。"

此外，Lucy 充分理解社会文化融合与移民年龄有着很大的关联。作为成年后才赴澳留学的研究生，她亲身体验过适应新环境的困难。为了让女儿避免类似的挑战，她特意选择在女儿四岁时就移居新加坡，坚信越早移民越有利于孩子融入新加坡社会。她解释道：

"成年后再去融入一个新文化是非常困难的，包括语言障碍——当你和朋友随意聊天时，可能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这种感受我很清楚，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从小就能融入（新加坡）这个圈子。"

Lucy 的做法与 Choi 等人（2024）关于中国精英和中产阶级父母如何通过让子女早出国来传递跨国文化资本的最新研究形成呼应。然而，不同于 Choi 等人强调早期海外经历旨在培养全球视野，Lucy 更关注为女儿的社会融合创造更顺畅的路径。

### 对中文学习的投资

其次，研究发现移民父母——特别是那些不掌握新加坡任何一种官方母语<sup>2</sup>的家长——倾向于将经济资本转化为子女的文化资本（包括中文语言能力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以促进其在新加坡的社会文化适应。来自印度的父亲 Arjun 自女儿两岁半接触中文起，就持续为她安排每周两次中文补习课程（一次小组课和一次一对一课程）。他解释说，这项教育投资旨在帮助女儿"在人生非常早期的阶段就开启其的融和过程"。同样，印度籍家长 Lagan 也为女儿聘请了私人中文教师，每周安排四次课，因为他坚信中文能力"对其在融合上会非常有帮助"。

这种将中文语言的学习与社会融合相联系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出人意料。尽管中文是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但它既非通用语言，也非主要教学语言（Y. Tan, 2014）。实际上，英语才是新加坡事实上的国家语言，广泛应用于商业、政府行政和教育领域，

---

<sup>2</sup>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其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分别作为华人、马来人和印度族群的官方母语。

同时也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之间的主要交流媒介（Rahman & Tong, 2013）。现有研究表明，虽然越来越多非华裔家长选择让孩子学习中文，但这种选择往往基于“语言工具主义”考量——即家长将中文能力视为一种文化资本，有助于子女在中国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Wee, 2010）。在新加坡语境下，中文很少被视为社会融合的工具。正如 Liu (2014) 所指出的，新加坡政府更鼓励移民掌握英语，以便与不同族群交流，从而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社会。

我们研究发现，大多数移民父母对其 1.5 代和第二代子女的英语能力持乐观态度。这些家长认为，由于子女或在新加坡出生，或在幼年时期移居此地，并长期浸润在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校园环境中，他们在英语掌握方面几乎不存在障碍，能够达到接近母语者的水平。因此，英语能力并未被视为子女融入新加坡社会文化的潜在阻碍。然而，以 Arjun、Lagan 为代表的非华裔语言少数族裔移民父母则持有不同观点。他们担忧仅凭英语能力不足以让孩子真正融入新加坡社会。在他们看来，鉴于新加坡本质上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子女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资本——特别是对华人群体的语言和文化的理解——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融和。菲律宾籍母亲 Jessica 同样持此观点，她为两个儿子的华语学习投入了大量资源，并解释道：

“除了英语，华语在新加坡的使用频率也接近 50%，特别是在日常交流中… 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融入这里，毕竟大多数学生都讲华语。虽然也有马来人和印度人，但华人占多数，不是吗？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融入其中，这样就能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交朋友。”

总体而言，这些非华裔移民父母通过调动经济资本，积极投资于子女的华语学习，旨在帮助子女掌握华语语言能力及相关文化规范与价值观。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试图为子女积累那些被认为有助于融入新加坡以华人社群为主流社会所必需的文化资本。

### 维持对来源国文化的认知

第三，研究发现移民父母在帮助子女适应新加坡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和规范的同时，也积极支持子女保持对于原籍国的文化认同。这一发现与 Berry (2005) 提出的“融合”(integration) 概念相吻合——成功的融合不仅需要移民积极参与和融入东道国社会，同时也应当保留自身的文化传统。研究显示，部分移民父母会主动调动自身的社会资本，为子女创造与同文化背景人群交往的机会，以此培养子女的同乡社交网络，并在海外生活中维系与原籍国文化的联系。以育有两子的母亲 Audrey 为例，她通过跨国方式运用社会资本，将自己的孩子与中国大陆朋友的孩子建立联系。她认为，为子女建立有意义的跨国友谊能够促进他们更深入地接触祖籍国社群，同时在新加坡扎根成长：

“我们确实有意识地帮她维持在中国的社交联系。比如我们会让她和我们朋友的同龄孩子保持联系，希望她能在不同地区都建立社交网络...这样她就能了解中国同龄人的生活和话题。”

菲律宾籍父亲 Gene 与 Micah 同样重视通过促进子女与同乡群体的互动来维系原籍国文化联系。他们通过积极参与新加坡菲律宾社区的教会活动，有效调动了自身积累的社

会资本。每周日，他们都会带领子女参加教会礼拜活动，孩子们也同时参与主日学课程。Gene 特别指出，这种参与不仅帮助子女与其他菲律宾移民儿童建立友谊，更为他们提供了了解菲律宾文化历史的机会。正如他所言，教会社群提供了一种“间接且非正式的教育途径，使孩子们（能够）与自身文化根源保持联系”。这一发现与现有关于移民教会作用的研究相呼应——教会在维系共同宗教信仰的同时，也支持移民群体在东道国的文化传承与社会融合 (López-Sanders, 2012)。

然而，尽管多数父母都采取融合策略，支持子女同时认同原籍国与新加坡文化，印度籍父亲 Arjun 对文化传承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他期望女儿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原籍国）保持自豪感，但认为这种认同应当适度，以避免造成与新加坡主流社会的文化隔阂：

“我希望她能意识到我们文化的存在，但不必过分强调...了解自身身份只是为了让她明白自己是谁，并为此感到自豪。但同时也要把握分寸，因为过度强调反而可能制造隔阂。”

因此，对 Arjun 而言，在支持女儿融入新加坡社会的过程中，首要任务是帮助她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建立有机联系和融合。

## 结论

本研究系统考察了新加坡新移民父母如何通过调动多种形式的资本——包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来促进其 1.5 代和第二代子女在学业和社会文化层面的

融合。在学业融合方面，研究发现新移民父母展现出卓越的资源调动能力，能够有效运用"聚合型"与"桥接型"社会资本（Putnam, 2000）帮助子女适应新加坡的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往往与他们自身的成长经历存在显著差异。研究显示，非华裔移民父母更倾向于依靠"桥接型"社会资本，包括通过职场关系、邻里交往以及KiasuParents.com等在线社区与本地新加坡家长建立联系。这些本地社交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关于学校选择、课程设置和课外辅导资源的重要信息和指导。借助这些本地化资源，非华裔移民父母能够做出更加明智的教育决策，从而有效促进子女在新加坡教育体系中的适应和成功。

相比之下，华裔移民父母主要利用"聚合型"社会资本，即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参与家长群组建立的同乡网络。这些群组成为交流学校录取、科目选择和课外活动等关键信息的重要渠道。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华裔家长指出，从同乡网络获取的信息与从本地社交圈获得的信息相比，不仅同等重要，有时甚至更具参考价值。这一发现促使我们对"聚合型"社会资本在整合移民资源方面不如"桥接型"社会资本的传统观点（Trevena 等, 2016）提出质疑。然而，也有家长表达了对这些同乡网络可能在新加坡复制中国高度竞争性教育文化的担忧，这与他们期望子女融入新加坡相对宽松教育环境的初衷相矛盾。因此，部分华裔家长最终选择与同乡保持一定距离，转而营造更符合新加坡教育理念的成长环境，以更好地支持子女的学业和社会适应。

本研究还发现，在促进子女社会文化融合方面，新移民父母同样展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部分父母充分利用其在过往移民经历中积累的跨国文化资本，以降低子女适应东道国社会的难度。另一些父母，特别是非华裔语言少数群体的家长，则将经济资本转

化为子女的文化资本——包括中文语言能力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这些父母而言，投资中文教育不仅是为未来就业做准备，更是确保子女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社会中获得归属感的重要途径。这一发现颇具启示性，因为尽管英语是新加坡的通用语言，且官方融合政策强调英语能力对顺利融入的重要性，这些家长仍然将中文能力视为子女实现社会文化融合的一个关键要素。

与此同时，许多新移民父母致力于保持子女与祖籍国的紧密联系。他们通过调动跨国社交网络扩展子女在祖籍国的社交圈，或促进子女参与同乡社群活动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努力与其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实践相辅相成，也印证 Berry (2005) 提出的融合概念——即移民在积极融入东道国社会的同时，仍保持自身文化传统。

综合而言，本研究揭示了新移民父母如何通过多元化方式调动各类资本资源，支持 1.5 代和第二代子女融入新加坡社会。通过有效运用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这些父母不仅在帮助子女适应新加坡教育体系方面成效显著，更在促进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融合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